

何為「文化革命」？ ——文化大革命發生學再探（下）

● 吳一慶

編者按：本文第一至四節已於2023年12月號刊出；本期刊出第五至九節。

五 兩種「文化革命」：對立的〈二月提綱〉與〈二月紀要〉

在幾乎所有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權威敘述中，《海瑞罷官》事件都被視為是發動文革的「導火索」，為毛澤東在幕後一手操控、江青秘密策劃執行。至於為甚麼《海瑞罷官》成為批判對象，這被認為是一石二鳥或暗渡陳倉的謀略：明面上的矛頭指向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實則針對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而背後的實際目的是打擊劉少奇和鄧小平。這一說法廣為學界接受，但至關重要的問題是，應該如何理解這一「導火索」的意義？《海瑞罷官》事件「引爆」的究竟是何種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引爆」的過程和機制究竟為何？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要考察1966年2月形成的兩份重要文件：〈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匯報提綱〉（又稱〈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或〈二月提綱〉，以下簡稱〈提綱〉）和〈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又稱〈二月紀要〉，以下簡稱〈紀要〉）。

簡言之，彭真主持形成的〈提綱〉是《海瑞罷官》事件發酵的直接結果。姚文元發表批判《海瑞罷官》文章後，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彭真等高官皆不明就裏，學界起初的反應也相當冷淡，北京各報刊及全國各大報逾半月不予轉載，引起毛澤東強烈不滿。在毛澤東的干預下，從1965年12月到1966年1月，報刊上發表了一系列粗暴批判吳晗及其他學術界知名人士的文章，批判範圍迅速擴大，火力愈來愈猛烈。2月3日，彭真召集五人小組開會討論學術批判問題，並整理形成〈提綱〉；5日，經劉少奇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議通過。8日，彭真率五人小組成員赴武漢向毛澤東匯報請示，毛澤東對此文件未表示

異議，對於《海瑞罷官》事件也表示了溫和的態度，指示對批評者與被批評者兩邊都要「寬」^①。12日，〈提綱〉作為學術與意識形態批判的指導性文件下達全國^②。

〈提綱〉和〈紀要〉同為意識形態鬥爭的綱領性文獻，不過二者對「文化革命」的表述與規定有極大差別。〈提綱〉首先在原則上肯定從批判《海瑞罷官》開始的學術批判：「蓋子揭開了，成績很大」，「這場大辯論的性質，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同資產階級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場大鬥爭」^③。但〈提綱〉主張通過和緩而非急風暴雨、粗暴的方式，有領導、有組織，謹慎地搞好學術批判，「要估計到這場鬥爭不是經過幾個月，有幾篇結論性文章，或者給某些被批評者做出政治結論，就可能完成這個任務」。〈提綱〉指示：要採取「放」的方針，讓各種不同意見都充分表達出來；要擺事實、講道理，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報刊上公開點名做重點批判要慎重，要經過有關領導機構的批准；要形成一支「革命的、戰鬥的、又紅又專」的左派隊伍，進行學術研究，掌握大量資料，不僅要在政治上壓倒對方，而且要在學術和業務水平上真正超過對方；左派也要整風，要警惕左派走上「學閥」的道路。〈提綱〉強調文化鬥爭的漸進性和學術性、要以與人為善的態度對待批評對象，以及「左派」不應「武斷」和「自以為是」，這實際上是在警誡姚文元之類的激進文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相對理性、溫和的「文化革命」版本。

可是，幾乎同時產生的〈紀要〉卻勾畫出一幅截然不同的圖景。1966年2月，江青主持召開關於部隊文藝工作的小型座談會，主要內容是看電影、看戲、閱讀文件與材料。據帶領幾位軍隊文宣部門主要官員參會的總政治部副主任劉志堅回憶，會議期間總共看了三十多部電影和三場戲，另有十幾次個別交談和集體座談，主要是聽江青表述她的文藝觀點以及對作品的看法。江青在會議一開始就說：「我們的文藝界不像樣，讓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統治舞台」，「有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現在該是我們專他們的政的時候了」，「現在的論戰，還只是前哨戰，決戰時機尚未到來」。江青還談了她怎樣給毛澤東當「文藝哨兵」，如何親自買票下劇場，發現京劇存在很多問題，毛澤東的批示沒有得到貫徹，所以她要推動「京劇革命」。她還講到推行京劇改革遇到的困難，北京市委不支持^④。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結束後形成的紀要，陳伯達、張春橋等人參與修改、整理。毛澤東也高度重視，多次審閱、修改，並將標題定為〈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⑤。

〈紀要〉全文共一萬餘字，其中提到「文化革命」或「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十四次，「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意識形態領域裏的社會主義革命」、「意識形態的革命」各一次；文中亦十數次提到文化戰線中的「兩個階級的鬥爭」、「兩條路線鬥爭」、「興無滅資的鬥爭」等，這些提法的內涵基本大同小異。〈紀要〉全面和系統地闡述了文化領域階級鬥爭的尖銳性、必要性和緊迫性，這是一個激進版本「文化革命」的綱領性文獻。〈紀要〉指出，「近三年來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但是

「中央有關部門和絕大多數黨委，對文藝戰線上的階級鬥爭卻一直認識很不夠，抓得很不夠」，這種情況「必須迅速地切實地加以改變」。〈紀要〉的重點是從整體上否定中共建政以來的文藝工作，認為存在着尖銳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文化戰線上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文藝界被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紀要〉指出，1950、60年代的一些與主流意識形態相左的文藝觀點，例如『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論、『現實主義的深化』論、『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等，都是這條「文藝黑線」的代表性論點，「而這些論點，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早已批判過的」。〈紀要〉稱，「在這股資產階級、現代修正主義文藝思想逆流的影響或控制下，十幾年來，真歌頌工農兵的英雄人物，為工農兵服務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間狀態的作品；還有一批是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紀要〉號召「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毛澤東特意在此加寫道：「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紀要〉還熱烈頌揚江青主導的文藝革命和京劇革命：「近三年來，社會主義的文化大革命已經出現了新的形勢，革命現代京劇的興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文藝工作者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向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和現代修正主義文藝展開進攻，使京劇這個最頑固的堡壘發生了極大的革命，並且帶動文藝界發生着革命性的變化。〈紀要〉呼籲要保衛和發展「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初步成果」，「把社會主義文化革命進行到底」，「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領導人要親自抓，搞出好的樣板」，並強調「文化革命解放軍要起重要作用」。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轉發了經毛澤東審閱修改的〈紀要〉，指出〈紀要〉「適合於整個文藝戰線」，要求各級黨委「聯繫本地區、本部門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認真研究，貫徹執行」。這是中共建國後第一份以江青作為主角的「中央文件」，自此，原本不為全黨熟知的江青走上了國家政治生活的前台，這也為次月她成為新設立的中央文革小組的實際領導人作好了鋪墊。

〈紀要〉和不久後頒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五一六通知〉，下詳），與本文上篇提到毛澤東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對於文藝問題的批示相呼應，反映了他對意識形態領域鬥爭形勢的嚴峻估計以及發動一場激進「文化革命」的決心。〈紀要〉下達後，1966年4月18日《解放軍報》以〈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為題發表社論（《人民日報》次日頭版轉載），這是一篇激進文化運動的宣言，首次把〈紀要〉的主要內容公之於眾。社論稱建國後「文藝界存在着一條與毛澤東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指出「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必須有破有立」、「不徹底破，就不能真正立」，並號召「堅定不移地把社會主義文化革命進行到底」，「從根本上消除一切剝削階級毒害人民群眾的意識形態」^⑥。作為續篇，5月4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紅旗》雜誌11日轉載），指出文化戰線的革命不僅僅是幾篇文章、幾個劇本、幾部電影的問題，也不僅

是學術之爭，而是一場尖銳複雜、長期的階級鬥爭，「需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社論指出，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場思想領域內的徹底革命；號召「在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以及其他各種文化界中，大興無產階級思想，大滅資產階級思想」，「堅決把社會主義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⑦。8日，《解放軍報》發表署名高炬（「高舉」的諧音）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人民日報》次日頭版轉載），號召廣大群眾「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把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不獲全勝，決不收兵」^⑧。10日，《文匯報》、《解放日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人民日報》次日轉載），與高炬在《解放軍報》發表的文章南北呼應，姚文元的文章指控吳晗、鄧拓、廖沫沙等彭真下屬「把持和壟斷了北京市的思想文化工作領導崗位」、「充當了反動階級和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向黨進攻的喉舌」，他們「露骨地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的學術路線」、「堅持反動的地主資產階級道德」、「力圖使幹部、青年蛻化變質，全面地、徹頭徹尾地實現資本主義復辟」^⑨。就這樣，從4月中下旬開始，以《解放軍報》為首，《人民日報》、《紅旗》等報刊紛紛跟進，發表文章，刊登工農兵來信，舉辦座談會，對大批黨內外知名知識份子被冠以「毒草」之名的作品發起狂轟濫炸，一場文化與意識形態領域的大批判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六 反擊戰：「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就要開始了」

從1966年春起，毛澤東開始頻繁使用「文化革命」及類似語詞。3月，毛澤東多次審閱、修改江青遞呈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如前所述，在「我們一定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後，他加寫道：「搞掉這條黑線之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過去十幾年的教訓是：我們抓遲了」，「只抓過一些個別問題，沒有全盤地系統地抓起來，而只要我們不抓，很多陣地就只好聽任黑線去佔領，這是一條嚴重的教訓」。

1966年3月中旬、4月下旬、6月上旬，毛澤東在杭州主持召開了三次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主題皆與即將或剛剛啟動的「文化革命」有關。3月17至20日，他主持召開第一次杭州會議，主要議題是「對當前的文化革命交換意見」^⑩。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一改一個多月前對於《海瑞罷官》問題較為模糊、溫和的態度，對文化領域的口氣更為激烈嚴苛，明確提出「要搞文化大革命」。他說：我們在解放以後，對知識份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由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愈深入，他們就愈抵抗，就愈暴露出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實際上是國民黨」。現在許多地方對於這個問題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甚麼人手裏，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我們要培養自己的年青

的學術權威，文、史、哲、法、經要搞文化大革命，要堅決批判，到底有多少馬克思主義^⑪？

3月18日，毛澤東在談到學術批判時指出，要奪取文教領域的領導權，首先必須打倒「權威」：「我的意見，還是要打倒甚麼翦伯贊呀，侯外廬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這些人都是資產階級，帝王將相派。優柔寡斷，我們黨內這種人相當多啊！」^⑫20日，毛澤東又說，「過去我們是蒙在鼓裏的，許多事情不知道，事實上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掌握的。……現在，大學、中學、小學大部分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富出身的人壟斷了。沒有五年到十年的工夫批評一下，講點道理，真正培養、教育出一批接班人，就都要控制在他們手裏。這是一場廣泛的階級鬥爭」^⑬。毛澤東還說，要改變文教界被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的狀況，有兩種辦法，「一種是開展批評，一種是下鄉勞動、半工半讀、搞四清」^⑭。

文革期間流傳的杭州會議講話記錄包含的信息量更為豐富，毛澤東在這次講話中對史學界和教育界大加鞭撻，還特意點了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的名，提出老一輩史學家反對大躍進期間的「史學革命」（「史學革命」與「教育革命」是大躍進期間「文化革命」的重要部分）。他指出：現在大、中、小學大部分都是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壟斷了。解放後，我們把他們都包下來，當時包下來是對的。現在搞學術批判，也要保護幾個，如郭老、范老（指郭沫若、范文瀾），也是帝王將相派。今後每隔五年、十年的功夫批評一下，講講道理，培養接班人，不然都掌握在他們手裏。范老對帝王派將相很感興趣，反對1958年研究歷史的方法（林彪插話：這是階級鬥爭）。批判時，不要放空炮，要研究史料。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不然將要出修正主義，將來出修正主義的就是這一批人。如吳晗、翦伯贊都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們倆都是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卻反對共產黨，反對唯物論（林彪插話：這是一場社會主義思想建設）。這是一場廣泛的階級鬥爭^⑮。

毛澤東進一步強調，開展意識形態批判與「文化革命」要依靠新生力量，「不要壓制青年人的文章」，要鼓勵年輕人挑戰權威。他說：不要壓青年人，讓他冒出來，好的壞的都不要壓。把新生力量，如學生、助教、講師、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來；將剩下一部分死不轉變的老教授孤立起來，能改就好，不改拉倒。就是要教授給學生打倒（林彪插話：這些人只想專政）。年紀小的、學問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學問多的（朱德插話：打倒那些權威。陳伯達插話：打倒資產階級權威，培養新生力量，樹立無產階級權威，培養接班人）。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誰能融化誰，現在還沒有解決。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毛澤東還說：「現在准許鬧獨立性」，「學生要造反，要允許造反。文化革命要搞群眾運動，讓學生鳴放。我贊成挖他們的牆角，包括挖部長的牆角」^⑯。他認為文藝、教育、學術領域的問題已經發展到令人不可容忍的地步，決意採取行動，明確打出「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旗號，發動一場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的決戰。

1966年3月間北京與上海的一次話語衝突進一步加劇了毛澤東對於中央文宣部門的不滿。〈二月提綱〉下發後，粗暴的學術批判一度被抑制。黨內激進人士雖然不滿，但〈提綱〉是彭真等人向毛澤東匯報後以中央名義發出的，他們不敢輕易造次。3月上旬，時任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的張春橋派市委宣傳部長楊永直去北京探問有關〈提綱〉的情況，特別是其中所說的「學閥」是否具體有所指向，以及日後發重要的學術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審查。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請示彭真後答覆：「學閥沒有具體指甚麼人，是阿Q，誰頭上有瘡疤就是誰」，「過去上海發姚文元的文章，連個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黨性到哪裏去了？」^⑦楊永直返滬向張春橋匯報，張春橋當即斷定：所謂「學閥」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這是針對毛主席的」，是說「主席武斷，上海市委以主席之勢壓人」^⑧。3月底，江青、康生向毛澤東匯報此事，毛澤東震怒質問道：為甚麼吳晗寫了那麼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卻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他直指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我們面臨着文化革命，中央機關還有保皇黨」，「現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知識份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面目」，「必須進行這場文化革命，反對修正主義」^⑨。

彭真對批判《海瑞罷官》的抵制和怨言，使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朝內有人」、中央有「保皇黨」，北京市委和中央宣傳部門壓制左派、不准革命，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康生在向毛澤東匯報彭真指責發表姚文元文章是缺乏黨性時，有意將北京市委和中央文宣部門與毛澤東對立起來，煽風點火道「這是整到主席頭上了」，從而成為刺激毛澤東決意發起反擊戰的最後一根稻草：「再不發動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⑩3月30日，毛澤東同康生、張春橋、江青談學術批判問題時說：八屆十中全會做過決議，要在全國搞階級鬥爭，「為甚麼學術界、歷史界、文藝界可以不搞階級鬥爭？孫悟空鬧天宮，你是站在孫悟空一邊，還是站在天兵天將、玉皇大帝一邊？」「甚麼叫學閥？學閥就是那些包庇反共知識份子的人。要支持小將，保護孫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組、中宣部、北京市委，不管哪個省市」，「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頂住？中央會不會出修正主義？沒有解決。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⑪。

毛澤東發話後，形勢急轉直下。3月31日，康生返京傳達毛澤東的指示。4月2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報告為「文化革命」準備採取的措施：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大旗，徹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動學術思想，徹底揭露反動學術權威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立場，嚴格看待奪取文化戰線上領導權的問題，以利興無滅資，組織自己隊伍，打倒反動學術權威的鬥爭，並擬按此方針，起草一個中央通知，送主席審閱。9至12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貫徹毛澤東關於「文化革命」的指示。會

上，周恩來和鄧小平一起指出彭真執行的錯誤路線「是同毛主席思想對立的，是反對毛主席的」，並檢討了常委「失職」的問題²²。會議決定：一、起草通知，批判五人小組〈提綱〉的錯誤；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即中央文革小組的前身）²³。

4月16至24日，毛澤東再次在杭州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是為第二次杭州會議。會議「集中批判彭真」，並討論撤銷五人小組及〈提綱〉、重新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等問題²⁴。22日，毛澤東在會上說：「我不相信只是吳晗的問題，這是觸及靈魂的鬥爭，意識形態的，觸及的很廣泛。朝裏有人，各大區、各省市都有，比如文化局、宣傳部等等。鬥爭要逐步地展開，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要批評一二個。軍隊也有。所謂朝裏，不光中央，部門，包括各大區、各省市。朝裏那樣清，我不相信」，「各地方黨委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都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過去沒有系統管，首先從我起，沒有全面地抓。……現在抓嘛！不破不立，徹底破，破中有立」²⁵。4月中，毛澤東對正在北京召開的共青團九屆三中全會作出指示：「這方面的革命（指文化大革命）要靠青年，黨中央號召你們青年要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你們青年批判到那裏，黨中央就支持到那裏。」²⁶23日，他在審閱高等教育部關於深入開展學術批判的簡報時批示：「各地區大學師生，中學教員和高中學生，都應參加到文化革命運動中去。」²⁷24日，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通知稿（〈五一六通知〉前身）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²⁸。同日，鄧小平建議「文化革命搞六個月結束」，毛澤東表示同意²⁹。

第一、二次杭州會議是「文化革命」發動過程中的重要事件，毛澤東決意發起一場更為激進的「文化革命」，以反擊和取代彭真和中央文宣部門領導的有組織、有序的「文化革命」。據時任解放軍總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回憶，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向包括邱會作在內的多位高級將領通報第二次杭州會議情況時說，「要進行反擊戰了」，「反擊戰就是毛主席決定，要反擊他們〔彭真、陸定一等〕正在領導進行的文化革命」，「毛主席在會上還做了重要指示，說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就要開始了」³⁰。

七 「文化革命」視野中的〈五一六通知〉

（一）再審關於〈五一六通知〉的流行觀點

一場針對「文化革命」的反擊戰開始了。1966年5月4至26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身在杭州沒有參會，但議題和文件都是他事先確定和安排的。據與會的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回憶，主持會議的劉少奇宣布主題是討論「『文化革命』的路線問題」³¹。會上康生作了長達八小時的講話，介紹彭真「反黨、反毛主席」的情況，並傳達毛澤東近來關於批判彭真、陸定一和文化界以及要解散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一系列指示。康生說，主席的談話概括起來是兩條：一是批判彭真和中宣部包庇右派、壓制左派、不准

革命，二是給任務，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學術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張春橋詳細介紹了上海發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文章的情況，以及八屆十中全會後文藝界鬥爭的背景。陳伯達則着重揭發和批判彭真歷史上的問題，「新賬老賬一起算」是中共黨內鬥爭的慣用手段^②。劉少奇在會上談了學習毛澤東思想、開展「文化革命」的意義問題，並就對「文化革命」的認識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對於這個問題，我們過去也是糊塗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內。我最近這個時期對於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很多材料沒有看，接不上頭。」^③

5月16日，會議正式通過新成立的中央文件起草小組草擬的〈五一六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毛澤東多次修改草稿，一些重要段落均由他親筆改寫或加寫。一年後，〈通知〉在《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時被譽為「偉大的歷史文件」，「提出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路線、方針和政策」，「吹響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軍的號角」^④。

無論是文革期間官媒，還是文革後學界，都毫無例外地一致認定，〈通知〉不僅濃縮地表達了毛澤東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亦標誌文革的正式發動。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此有很經典的論述：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主要依據是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已混進黨、政、軍及文化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⑤。長期以來，這一文革研究最核心的觀點以不同形式出現於各種敘事中。然而，此處的關鍵問題是：〈通知〉所標誌正式發動的文革，究竟是何種意義上的「文化大革命」？

筆者以為，這一久已固化為常識的觀點並不完全符合史實。第一，通過「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的方法來發起一場「政治大革命」並非〈通知〉的主旨。第二，〈通知〉在當時也並非公開的動員性文本，而是只有十七級以上的幹部才能接觸到的黨內機密文件^⑥。儘管它的內容很快以各種方式進入公眾視野並起到大眾動員的效用，但全文卻在一年後才公開發表。第三，〈通知〉的核心內容是批判以彭真為首的五人小組制定的〈二月提綱〉所代表的相對和緩、有序、可控的「文化革命」路線。它指責〈提綱〉是「根本錯誤的」，違反和抗拒毛澤東的「文化革命」路線，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見製造出來的」，「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志的同意」^⑦。〈通知〉要求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這是為開展「文化革命」反擊戰所採取的組織措施。第四，如前所述，如果我們認為文革的起源和發端是一場激進文化運動的話，那麼，最早宣示並系統闡述這場「文化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並非〈通知〉，而無疑是江青主持編寫的〈二月紀要〉。

在〈通知〉中，毛澤東寫下極富戰鬥性的號召：「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

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通知〉宣布撤銷〈提綱〉，並用大量篇幅對之進行批判，同時提出一整套關於「文化革命」的激進理論和方針。毛澤東在〈通知〉最後加寫了一段措詞尖銳、後來被視為「畫龍點睛」的文字，長期以來成為理解〈通知〉的鑰匙和敘述文革發動的主要依據：「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1967年劉少奇被公開打倒後，很多人頓時大悟，〈通知〉中所提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睡在我們的身旁」的「接班人」原來指的是劉少奇。而「『文化大革命』要席捲的」，如中共黨史專家金春明所言，「決不是『文化領域』的這『五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而是無所不包的各行各業」^③。另如卜偉華在其權威性的文革史著作中寫道：「〈通知〉以彭真為批判的靶子，實際上又絕不僅僅是批判彭真。毛澤東的真正目標是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央第一線，在時機尚未成熟時，毛澤東使用了『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這種說法。」^④這樣的觀點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然而筆者認為，這種以後發之事倒敘前因的「輝格式」歷史未必符合事實。從〈通知〉的文本邏輯及其所處的特定歷史語境來看，文中所言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實際上指的是彭真及中央文宣部門領導層，並無證據是暗指劉少奇；文革的最初目標，正是意識形態與文化領域。原因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與〈紀要〉相似，〈通知〉形成的具體歷史語境是文化領域中的批判與革命。〈通知〉對文化領域的基本情況作了這樣的描述：牛鬼蛇神與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多年來塞滿了我們的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講演、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等」。這一概括完全抹煞了中共建國後文化戰線上的成就，認為文化領域裏無產階級被資產階級專了政，是毒草叢生、牛鬼蛇神充斥的黑暗世界。〈通知〉宣稱：「我國正面臨着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這個高潮有力地衝擊着資產階級和封建殘餘還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陣地和文化陣地」；它批評各級幹部對於「在思想戰線上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發動一場新的激烈鬥爭」執行不力，「許多地方還沒有開始參加鬥爭，或者雖然已經開始了鬥爭，但是絕大多數黨委對於這場偉大門爭的領導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通知〉號召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奪取「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第二，〈通知〉的指向性非常明確，其主要內容是批判彭真及其主持制定的〈提綱〉。〈通知〉（包括正文和附件）中提到彭真名字達九十四次之多。它列舉〈提綱〉多條罪狀，包括：一、面對「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不是放手發動群眾，而是力圖模糊文化戰線上尖銳的階級鬥爭；二、把文化領域的鬥爭納入所謂的「學術」討論；三、強調「放」，意在包庇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四、用「在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保護資產階級；五、強調「有破有立」，實為對資產階級思想不准破，對無產階級的思想不准立；六、給左派戴上「學閥」帽子，要對左派進行「整風」，以打擊左派、轉移鬥爭目標；七、強調鬥爭要「有領導」、「謹慎」，給左派劃框框、給無產階級文化革命設置障礙；八、抗拒毛澤東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等。〈通知〉有一個約九千餘字的附件，以編年體形式記述了圍繞着《海瑞罷官》事件以及學術批判的重要事件。如果比較一下這兩份文件，〈通知〉正文提出了批判彭真和〈提綱〉的觀點，而附件則提供了論據。

第三，據參加起草〈通知〉的王力的回憶，起草小組的整理修改工作實際上由江青負責。與兩個月前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相似，江青每天組織大家看電影，「看那些她認為有問題要批判的電影」。江青與中宣部及以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曾因文藝批判與京劇改革問題發生過嫌隙，在起草小組工作期間，她「經常罵彭真、罵中宣部閻王殿，罵北京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讓她自己如何受打擊，沒人理，說閻王殿的閻王我一個一個殿都去拜望，一個個副部長我都登門拜訪，可是沒有人理我，在北京沒有一個人支持我，我只好依靠上海」、「靠部隊，靠林總」。江青還將尚未公開發表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提供給小組當作起草〈通知〉的參考⁴⁰。據記載，〈通知〉初稿中原先並未點彭真的名，江青、康生後來在修改中加上點名批判彭真的文字，毛澤東表示同意⁴¹。

第四，〈通知〉提出要清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很多人把這當作是毛澤東要將矛頭指向高層乃至劉少奇的證明，這種理解事實上並無充分根據。學界在這方面長期以來對於〈通知〉一直存在一種錯誤理解，即將8月頒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以下簡稱〈十六條〉）的主題投射或疊加在5月發布的〈通知〉之上，從而把這兩個無論語境和內容都存在顯著差異的文本混淆起來。實際上，將「黨內走資派」當作文革運動的首要目標是〈十六條〉的主要內容之一（下詳），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語詞在〈通知〉中只出現過一次，且有明確指稱與限定，即「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在當時的語境下，這明顯指的是彭真以及其他推行或縱容相對溫和的文化政策的幹部，他們被視作激進「文化革命」的障礙和絆腳石，是運動首先必須打擊的目標。值得說明的是，〈通知〉裏「混進」、「鑽進」之類的語詞是1950、60年代中共政治話語中常見的詞彙。〈通知〉只是沿用了這種說法，但難以證明其有具體指稱劉少奇的特定涵義。換一角度看，通過〈通知〉的政治局會議除了批判彭真之外，同時也宣布打倒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⁴²，〈通知〉中「混進」黨、政、軍內部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之類的語言也為當時清洗其他高級幹部提供了政治說明。

第五，「赫魯曉夫」是1960年代中期中共政治話語中常用的符號和語詞⁴³，而我們無可靠證據表明〈通知〉中的用法是指劉少奇。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矛盾是毋庸置疑的事實。毛澤東明顯對劉少奇不滿始於1962年，當時中共這

兩位最高領導人就如何評價大躍進以及採取何種政策應對危機發生分歧^④。1964年底，兩人又在四清運動問題上產生矛盾^⑤。但是，他們在文革以前早有矛盾甚至衝突，並不足以充分證明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為了打倒劉少奇^⑥。簡言之，筆者以為，兩人在文革前的分歧在文革初期繼續發酵、激化，而導致決裂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劉少奇派遣工作組領導「文化革命」所引發的新的矛盾。毛澤東指責劉少奇派工作組是壓制群眾革命，「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甚麼馬列主義，都是假的」^⑦。面對毛澤東的指責，劉少奇卻執意頂撞：「無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條不怕。」^⑧於是，毛澤東斷然在1966年8月初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炮打司令部」，將劉少奇打入另冊。這也就是說，本文提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初目的是啟動一場「文化革命」，而〈通知〉的矛頭很可能並不是指向劉少奇，這與毛、劉之間存在分歧乃至衝突的史實並不存在邏輯性矛盾。關於這一重要問題，筆者將另撰文探討。

最後，受毛澤東指派參加起草〈通知〉的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親信人物，當時都一致認為「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指的是彭真，參加政治局會議的包括劉少奇本人在內的很多高級領導人也如此認為。1966年5月18日，劉少奇、周恩來在會見越南共產黨主席胡志明時通報說：「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已經挖出來了，顯然指的是彭真^⑨。賀龍在19日的大會發言中對彭真說：「主席批評赫魯曉夫在我們身邊，那還不是批評你呀！」康生也在會上指責彭真說：「你就是這樣的人物，你就是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這樣的人物。」^⑩8月10日，康生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說：「在草擬中央《通知》（按：指〈五一六通知〉）的時候，主席加了一段話，說修正主義睡在我們身旁，有的已經發現，有的還沒有發現。當時只想到彭真，沒有想也不敢想到接班人問題。」^⑪1967年3月，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肖華在一次軍隊幹部會議上說：「毛主席早就提醒和警告我們，北京出了赫魯曉夫怎麼辦？去年五月又說，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有的已經發現，有的還沒有被識破。那時我們對這一點還不夠理解，還睡在鼓裏頭，以為把彭真挖出來了，就挖得差不多了，沒有敢再去想一想。」^⑫5月，張春橋在上海的一次會議上說：「對『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這一段，我當時就不太理解，只想到彭真，完全沒想到劉少奇。」^⑬這些高級幹部對〈通知〉的反應很能反映當事人的理解。

其實，許多人把〈通知〉中「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的帽子扣到劉少奇頭上，是他倒台並被公開批判之後的事。在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因工作組問題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正式標誌與劉少奇的決裂，成為後者被打倒的開始；把〈通知〉最後一段話和劉少奇直接聯繫起來，也是從這時開始的。在十一中全會上，張春橋直接把矛頭指向劉少奇：「抵抗批判《海瑞罷官》的批判，不是彭真一個人的問題。彭真一個人不敢這樣狂妄。五人小組的提綱是經過常委會議討論通過的。」「在《海瑞罷官》這個問題上，有的同志談得輕描淡寫，好像同自己關係不大。事情果然是這樣嗎？」「從《清宮秘史》到《海瑞罷官》，……中間的幾次大批判，他的態度究竟如何？是站在哪一邊？過去沒有想過，現在應該想一想了。」^⑭儘管沒有直接點名，但張春橋此處所言的「他」顯然是指劉少奇。

隨著造反運動的興起，群眾運動文獻中對於劉少奇的批判從1966年底開始出現。然而，最早在官媒上公開指明「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就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革中劉少奇的別稱），是戚本禹1967年4月1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這是第一篇系統批判劉少奇的文章，在全國掀起了批劉的浪潮⁵⁵。5月18日，《紅旗》、《人民日報》發表紀念〈通知〉一周年的社論〈偉大的歷史文件〉進一步明確化：毛澤東所說的睡在我們身旁的「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就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內部的資產階級的總代表」，「現在查明，彭真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二月提綱》，就是他支持的，也就是他的綱領」⁵⁶。自此以後，各種官媒文本、紅衛兵大批判文章以鋪天蓋地之勢把「中國的赫魯曉夫」當作劉少奇的代名詞。

(二)「文化革命」全面開動

〈五一六通知〉下達後，1966年初夏，一場思想、文藝、學術領域中的大規模革命即「文化革命」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舊知識份子、「資產階級權威」、「黑幫」是運動的主要打擊對象。主要官媒發布的關於運動的言論，基本以〈通知〉和〈二月紀要〉為依據。

1966年5月31日，經毛澤東批准，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率工作組接管《人民日報》⁵⁷。陳伯達召集報社人員開會傳達中央指示，說這次運動就是要在意識形態領域裏徹底打垮資產階級，把輿論陣地奪回來，並破除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這成為「破四舊」口號的開始）。陳伯達指示發表一篇重磅社論，為文化大革命煽風點火⁵⁸。社論初稿題為〈再接再厲，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但他覺得不夠簡潔上口，先改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後定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發表後，文革運動迅速席捲全國。（圖片來源：《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第1版）

(以下簡稱〈橫掃〉)，6月1日在《人民日報》頭版發表，是為報紙改組後發表的第一篇重要社論^⑤。

〈橫掃〉社論首次披露了〈通知〉的內容，發表後舉國震動，轟轟烈烈的文革運動迅速席捲全國。如果說〈通知〉是激進「文化革命」的綱領，那麼〈橫掃〉社論便是其全面發動的動員令。社論宣稱，「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會主義中國興起」，這是一場意識形態和思想文化領域「破四舊、立四新」的革命，即「文化革命」：

解放十六年以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階級鬥爭，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目前的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正是這個鬥爭的繼續發展。……無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是反對一切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文化革命，……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創造和形成嶄新的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

社論要求億萬群眾「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要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⑥。值得注意的是，「牛鬼蛇神」一詞並非陳伯達的原創，包括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內的中共高層領導人在1950、60年代的反右、大躍進、四清等諸多政治運動中曾多次將其當作階級敵人的代名詞。在〈橫掃〉社論發表之前，「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之類的提法早就見諸報刊文章中^⑦。在當時，「牛鬼蛇神」特指「資產階級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右派、地富反壞等。但隨着文革運動的發展，「牛鬼蛇神」所涵蓋的範圍愈來愈大，愈來愈多的黨政幹部也被囊括在內。幾年後，連陳伯達自己也成了其中的一員。

〈橫掃〉社論吹響了文革的衝鋒號，掀起了輿論宣傳的高潮。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另一篇重磅社論，題為〈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文章說：社會主義革命進一步深入，必然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問題突出出來，「我們要抓意識形態，抓上層建築，搞理論，搞學術，搞文藝等等，鞏固無產階級的思想陣地」，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在「抓意識形態，抓上層建築，搞理論，搞學術，搞文藝等等」，「當前我們在思想文化戰線上進行的這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就是從思想上粉碎資本主義復辟陰謀的鬥爭，是從思想上挖修正主義根子的鬥爭」^⑧。

四天後，《解放軍報》發表一篇一萬三千餘字的長文〈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人民日報》同日轉載）。該文揉合〈紀要〉、〈通知〉、〈橫掃〉等文的內容，指出：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長期在文化界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路線唱對台戲。他們在報紙、廣播、刊物、書籍、教科書、文藝作品、電影、戲劇、曲藝、美術、音樂、舞蹈等文化領域裏，散播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思想。十六年來，思想文化戰線上的鬥爭，一場接着一場，一次比一次更深入，這是國內外階級鬥爭深入發展的表現。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總是頑強地表現自己，

拼命地固守着資產階級思想的頑固堡壘，猖狂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因此，絕不能把那些資產階級「學者」、「專家」、「作家」看作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是「幾條泥鰍，掀不起大浪，翻不了船」；不能認為在奪取了政權之後，就可以睡安穩覺了^③。

6月11日，《紅旗》雜誌發表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的社論，指出：蘇聯沒有認真地進行無產階級文化革命，斯大林逝世後，就發生了修正主義復辟。1956年匈牙利事件，就是一群反共知識份子發動的，「奪取政權要靠槍桿子、筆桿子，鞏固政權也要靠這兩桿子。我們要保衛和發展革命事業，不僅要牢牢地抓住我們的槍桿子，而且必須拿起無產階級的筆桿子，橫掃資產階級的筆桿子」，「不進行無產階級文化革命，不堅持消滅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無產階級專政就不能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就不能鞏固，資產階級思想自由泛濫的結果，必然是無產階級專政被顛覆」^④。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中發298號文件，將1966年高校招生工作推遲半年，文件中說：「有不少大專學校和中學，資產階級的統治還根深蒂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十分尖銳激烈」，推遲高校招生工作、改革招生考試辦法，以便「使高等學校和高中有足夠的時間徹底搞好文化革命」，把「文化革命運動搞深搞透」^⑤。

7月1日，《紅旗》雜誌重新發表毛澤東1942年舊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在按語中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開了建國十六年來文藝界黑線統治的蓋子，把一批又一批的牛鬼蛇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系統論述了革命新文化的路線和方針，被譽為當時正在進行中的文革運動的「綱領性文件」、「指南針」、「進軍號」^⑥。在1966年8月上旬發布的〈十六條〉中，毛澤東1940年代關於文藝和文化問題的舊文再次被奉為指導文革運動的「行動指南」，號召各級黨委「反覆學習」^⑦。這是非常有意思的，其意味深長之處是明示了這場運動的方向——重返延安革命文化年代。

八 〈十六條〉發布後的話語轉變：「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

如前所述，文革初期爆發的實際上是一場以意識形態鬥爭及文教領域的革命性變革為主旨的激進「文化革命」，而舊知識份子、「資產階級權威」、「牛鬼蛇神」——而非黨國體制及其整個官僚階層——則是這場運動的主要打擊對象。有證據表明，毛澤東本人在當時正是持這種理解。

1966年6月，中共最高層召開第三次杭州會議，討論文革的各種問題。6月10日，毛澤東在與北越領導人胡志明的談話中對當時正在進行中的文革運動作了解釋：

毛：我們最近這場鬥爭，是從去年11月開始的，已經七個多月了。最初，姚文元發難。他是個青年人，討論清官問題。現在我們不搞清官、貪官這件事了，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藝界、學術界、哲

學界、史學界、出版界、新聞界。文藝界又分好多界，有戲劇界、電影界、音樂界、美術界、雕刻界；戲劇界又分京戲和幾百種地方戲。

現在，主要是看大字報；報紙上也很熱鬧。大字報厲害得很，有群眾性，轟轟烈烈。

胡：1957年時我也在中國看過大字報。

毛：沒有這一次深入、廣泛。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幾百人、幾千人，特別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出版界、文藝界、大學、中學、小學。因為當時我們沒有人，把國民黨的教員都接受下來了。大、中、小學教員，辦報的，唱戲的，寫小說的，畫畫的，搞電影的，我們很少，把國民黨的都包下來。這些人都鑽到我們黨內來了。這樣一說，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胡：這次運動，對我是一次大的幫助。我沒有來中國之前，不知道鬥爭那麼激烈，那麼廣泛。聽了你們的談話，我比看報清楚得多了^⑥。

同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要論甚麼資格、級別、名望，不然這個文化陣地我們還是佔領不了的」，「在這場運動中湧現了一批積極份子，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他在講話中還特意提及北京大學的「第一張大字報」，「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⑦。

6月12日，毛澤東在談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時，着重強調教育領域的改革：「先奪權，批評權威，再搞教學改革、學制改革。中央要搞個高中、大學入學考試制度，辦法是學校推薦和選拔相結合」，「今年大學招考推遲半年，鬧半年文化大革命」，「教材要重編，初中、小學語文課本中，有毒的要去掉。過去教學改革、學制改革搞不動，改不了。這次要趁此來個大改革」。當有人提出「搞下去涉及不少人」時，毛澤東說：「打擊面也不會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⑧27日，正在訪問阿爾巴尼亞的周恩來在群眾大會上談到中國國內情況時提到，「最近幾個月來，我們轟轟烈烈展開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識形態領域內的一場十分激烈的階級鬥爭」^⑨。另據阿爾巴尼亞方面記載，周恩來在與該國領導人會談中說，「今年我們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但事實上這一運動的準備工作早已開始了」，「文化大革命深深觸動了人們的靈魂，這是一場思想領域的真正的階級鬥爭」，「這是一場最廣泛、最深刻、最激烈、最複雜、最持久的階級鬥爭」^⑩。這清楚地表明，至少在6月中下旬，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高層領導人仍把「文化大革命」理解為思想與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一場大革命，即「文化革命」。

但是不久後，中共最高層和官方輿論對於文革性質的理解和說法便發生了顯著變化，運動開始大大超出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這首先表現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這兩個重要文本間的差異中。8月8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十六條〉。〈通知〉和〈十六條〉的頒布是文革運動全面發動的標誌，這是學界的基本共識。同為文革的綱領性文獻，這兩個

文本之間存在基本的連續性，但其間的顯著差異，對於理解文革運動初期的多重複雜性具有重大意義。

〈十六條〉首先延續了〈通知〉中的「文化革命」主題，在篇首指出：「資產階級雖然已經被推翻，但是，他們企圖用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來腐蝕群眾，征服人心，力求達到他們復辟的目的。無產階級恰恰相反，必須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儘管〈十六條〉與〈通知〉在激進「文化革命」方面有着基本的連續性^③，但這兩個文件卻反映了明顯不同的文革觀。可以這樣認為，〈十六條〉的頒布是文革運動發生重大轉向的風向標。和〈通知〉相比，〈十六條〉對文革運動的目標、對象的規定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其中最重要的差異即從「矛頭向下」轉為「矛頭朝上」：運動的重點從鬥爭「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牛鬼蛇神」、「黑幫」、「右派」，轉向矛頭對準「黨內走資派」。令人費解的是，這兩份綱領性文獻之間的差異，多年來卻一直未為學界注意。具體而言，兩者至少在三個方面存在顯著差別：

第一，運動目標方面，〈十六條〉所規定的比〈通知〉更寬。〈十六條〉第一條明確規定了文革的目的：一、「鬥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二、「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三、「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十六條〉雖然延續了〈通知〉的激進「文化革命」的主題，但它規定文革的首要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派」（第一條、第五條），而文教及上層建築領域的批判和變革則被規定為文革的第二和第三目標。如前所述，〈通知〉作為激進「文化革命」的綱領，打擊「黨內走資派」並非其主要內容。實際上，「黨內走資派」這一名詞在〈通知〉中有明確所指，即那些「支持資產階級學閥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鑽進黨內保護資產階級學閥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第二，運動對象方面，〈十六條〉強調運動的阻力「主要來自那些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第二條），他們「『怕』字當頭」，「害怕群眾揭露他們」，「找各種藉口壓制群眾運動」，因此發動文革就必須要「撤換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回領導權（第三條）。〈通知〉雖然提出開展文革必須同時批判和清洗混進黨、政、軍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但打擊廣義上的當權派並非其主要內容。如前所述，〈通知〉裏所言的混進黨、政、軍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及「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並非泛指當權派，而具體指的是彭真和他的屬下之類的幹部。

第三，運動的方式和方法方面，〈十六條〉增加了全新的內容。〈十六條〉熱情讚頌「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他們用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大鳴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堅決地向那些公開的、隱蔽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舉行了進攻」，「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號召各級黨組織

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採用任何包辦代替的辦法」。〈十六條〉引入以群眾自我組織、自我革命為特徵的巴黎公社式激進想像，確定通過自下而上的選舉產生群眾性權力機構，群眾可以隨時批評和改選。「文化大革命」自此才真正具備了「大民主」和「大革命」的政治涵義，即「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中共體制的黑暗面，作為文革標誌的群眾性造反也真正獲得了政治合法性。而這種大規模群眾造反挑戰黨國官僚體制權威的「大民主」，以及通過「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願景，並非〈通知〉的內容。

〈十六條〉是在毛澤東的主持下，由陳伯達、王力等起草，經反覆修改易稿三十餘次而成。據記載，定稿前後的一些提法有不少差異，最後定稿時刪去了「黑幫」、「黑線」等前幾個月流行的政治詞彙^{②9}，激進「文化革命」的色彩和內容有所淡化。雖然定稿中仍保留了「牛鬼蛇神」、「右派」等語詞，但值得留意的是，這些已不再被認為是運動的首要打擊對象。〈十六條〉明確規定，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派」。與〈通知〉相比，〈十六條〉反映了文革目標的擴大和方向的部分轉變，已然超出文教宣傳領域，革命對象從舊知識份子、學術權威擴展到「黨內走資派」。借用時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的話，即「以共產黨自己為革命對象」，「革命革到自己頭上」^{③0}。文革運動的這一趨向在1966年6、7月間已初見端倪，7月中下旬後日漸明顯，到8月〈十六條〉發布後，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主題日趨淡化，而逐漸演變為一場大規模群眾性「清黨」運動。

林彪在8月13日中央會議上的講話，清晰地表達了這一轉向的基本面向。他說：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組織問題就是政權問題。政權究竟是掌握在甚麼人手上？是掌握在擁護毛澤東思想的人手上，還是掌握在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人手上？這是一個嚴重問題。只有組織機構革命化了，黨才能經受得住一切考驗。在幹部問題上，該升的升，該降的降，該留的留。文革就是一場旨在徹底清理幹部隊伍的「三個全面」和「三個罷官」的運動——「全面考察，全面排隊，全面調整」，通過考察幹部，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罷官；同政治思想工作搗亂的，罷官；沒有革命幹勁的，罷官。「這次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組織上要有個全面的調整」，並披露毛澤東已同意這一構想^{③1}。12月3日，林彪又在政治局會議上指出，「這次大革命是個大批判運動，對全國、全黨是個大批判、大審查、大教育，文化大革命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對幹部大批判，就是批判幹部的運動」^{③2}。

1966年8月23日，時為中共第四號人物的陶鑄在中國醫科大學的集會上從另一角度闡述了這一看法：「現在撒手讓你們揭，不管是誰，大家盡力揭」，「在文化大革命中懷疑一切是對的，但對毛主席不能懷疑，……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不能懷疑。至於一個系統、一個支部、一個部的黨委，是可以懷疑的。我們向共產主義前進，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能懷疑，此外，一切都能懷疑」。他強調這一次文革就是針對幹部的，尤其是老幹部：「老革命就

是以前革命，新問題就是要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很大的考驗，經過考驗可能有部分人不能過關。」^{②⑧}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5、6月間以意識形態領域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為重心的「文化革命」，發展到8月間鬥爭矛頭針對黨政機構與各級幹部的「三個全面」、「三個罷官」、「懷疑一切」的大審查、大清理、大清洗，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大的轉變。

對於運動的進一步發展，毛澤東採取的是放任自流和相機應變的態度，其措施有兩個方面：一是提出延長運動時間，突破前期的「鬧半年文化大革命」之限；二是容許擴大運動目標和對象，從文教與知識界人士擴大到各級黨政機關及當權派。8月28日，毛澤東聽取陶鑄、康生匯報，當談到外地學生不斷來京時，指出現在學生「心思不在學校，要到社會上去橫掃牛鬼蛇神。一鬥二批三改是我講的，現在群眾不聽了，他們已經超出了學校的範圍，超出了本單位、本市、本地區。現在學生心不在一鬥二批三改，我們在領導上、在報紙宣傳上硬要把學生拉到這個方面去，這是違反學生的潮流。文化大革命的時間，看來到年底還不行，先搞到春節再說」^{②⑨}。29日，毛澤東主持會議討論兩個多月來運動的情況，當李富春談到對部分中央部門的文革運動規定了十條意見時，毛澤東說：「一條也不要。何必十條？來一個放任自流。有十六條嘛，都不聽。讓它去搞。」^{②⑩}在談到黨政幹部廣泛受到群眾衝擊時，他表態道：「全國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準備個別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②⑪}

我們可以認為，1966年8月後文革運動的矛頭從「向下」轉為「朝上」，這大致吻合毛澤東自1964年底四清後期以來將鬥爭重點指向黨內當權派的基本思路^{②②}，但是並不意味着這源於其發動文革的預先構想。其實，這一轉變更可能是他在瞬息多變的運動進程中審時度勢、順勢而為、不斷調整目標與策略的動態性結果。素來高度自信的毛澤東對於不確定性乃至「亂」具有超常的心理承受力，他顯然認為，「天下大亂」並沒有甚麼大不了，最終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後來的事實卻證明，一旦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各種錯綜複雜的社會與政治矛盾便會集中大爆發，所造成的失控後果可能遠超出最高領袖原來所料。1966年10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坦承有三件事的後果大為超出他的預料：「一張大字報〔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一個紅衛兵，一個大串聯，誰也沒料到，連我也沒料到，弄得各省市嗚呼哀哉。」^{②③}次日，在談到幹部普遍受到紅衛兵衝擊時又說：「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給紅衛兵這封信，我還沒有發出，全國就搞起紅衛兵來了」，「現在學生不是衝得厲害嗎，沒有設想到的事情來了。來了就來了。這一衝，我看有好處。過去多少年我們沒有想的事情，這一衝就要想一下了」^{②④}。

與此同時，毛澤東本人對於文革性質的說法也發生了顯著變化。據王力回憶，毛澤東曾經在1966年8、9月間說到：文革是一場「反修防修大演習」，「要把所有幹部都放到火裏燒一燒」，讓所有幹部都「表演一番」^{②⑤}。9月15日，毛澤東在修改林彪接見紅衛兵的講話稿時，加寫了一段概括文革基本特性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根本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

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這次運動的重點，是鬥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⑥⑥}這顯然表明，此時的文革運動已經完全溢出文教領域或「文化革命」的範圍，毛澤東本人已明確把文革理解為一場以打擊黨內當權派為首要目標的大規模群眾運動，而四個月前〈通知〉所反覆強調的意識形態領域的激進「文化革命」，在他親筆加寫的這段關鍵文字裏卻消失了^{⑥⑦}。

12月26日，毛澤東過七十三歲生日，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參加。毛澤東在談話中說：「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後能不能保持住政權，能不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是新的中心課題。問題出在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階級鬥爭沒有完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同資產階級、特別是小資產階級在黨內代理人的全面較量，資產階級在黨內還有市場，還有大批幹部世界觀沒有改造好，這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市場。」席間毛澤東祝酒：「祝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⑥⑧}

九 結語：走出「輝格式史觀」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發表題為〈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社論，傳達最高領袖的最新聲音：「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社論宣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定要從機關裏、學校裏和文化各界裏，發展到工礦企業和農村，讓毛澤東思想去佔領一切陣地。」^{⑥⑨}5月18日，〈偉大的歷史文件〉社論中援引毛澤東的話，給出了迄今以來對於文革性質最為權威的表述：「毛主席告訴我們，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革命的主要對象是混入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同廣大工農兵、革命幹部、革命知識份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揭露出來，把他們那套修正主義貨色拿出來示眾，徹底批判，把他們鬥臭、鬥垮、鬥倒，對他們進行奪權鬥爭，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這是鬥爭的大方向，我們必須緊緊地掌握這個鬥爭的大方向」^{⑦⑩}。8月9日，林彪在總結一年多來的運動歷程時說，文革「實際是通過文化大革命達到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大革命，本質上是社會主義政治革命」^{⑦⑪}，從而為這一複雜的變化過程畫上了句號。

從1966年春夏之際的一場以「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牛鬼蛇神」等為鬥爭對象的激進「文化革命」，到同年盛夏針對黨內當權派的「三個全面」、「三個罷官」的大清理以及年末的「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再擴展到機關、工礦企業和農村的以揭批當權派為目標的群眾性「政治大革命」，文革運動自1966年上半年起約大半年時間內經歷了明顯的變化。這一歷史進程所包含的複雜、曲折變化，長期以來一直為學界忽視。基於此，本文提出以下三個緊密相關的觀點：

第一，我們需要把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初意圖放置於當時的特定歷史和政治語境中去考量。從大躍進失敗到1960年代中期，毛澤東對於文藝、學術等意識形態領域的情勢日趨不滿，這是發動文革的最初動因。

第二，我們沒有可靠證據表明意識形態與文化批判是高層政治鬥爭的反映或毛澤東權謀的一部分。文革初期在文藝、學術領域展開的鬥爭，溯其根源，是文革前中共高層倡導的激進文化運動在新形勢下的繼續發酵。1966年上半年，毛澤東認為他的激進文化理念受阻，因而決意發動一場「文化革命」以反擊和替代中央一線官員所主導的較為和緩、有序的意識形態鬥爭。也就是說，「文化革命」是主題，而不是破題；是本意或初衷，而非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策略性手段。

第三，1966年上半年毛澤東發動的激進文化運動以〈五一六通知〉為標誌性文本，然而，這場「文化革命」和1966年下半年以〈十六條〉為標誌、以打擊「黨內走資派」為主要目標的群眾性造反運動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甚至斷裂。

最後，作為本文主題和基本觀點的延展，筆者對毛澤東發動文革是精心「預謀」的這一常識性史學理解提出質疑。「預謀論」在文革學界佔據絕對統治地位，但此解釋主要基於對最高領袖的動機和心態的猜測，有論無據，缺乏說服力。筆者以為，文革初期歷史進程所包含的複雜、曲折變化，顯然難以單純用預先策劃的謀略的逐步展開與實現來圓滿解釋。如果借用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使用的戲劇比喻，我們或許可以把文革的開始和發動分為上、下兩個半場，倘若說上半場是毛澤東所「預謀」的話，那麼下半場則很可能是出於包括最高領袖個人意志在內的多種不同政治力量碰撞、角力、融匯所產生的未必可事先預知的結果。關於這一問題，筆者尚需進一步細緻求證。

嚴格地說，「文化大革命」或「文革」是很不縝密的觀念。我們不應因為上、下半場「文革」的稱謂相同，就斷定它們的歷史內涵也一定相同。「文化大革命」一詞的背後包涵了非常不同的歷史與政治內容以及變動軌跡，其差異性與多質性卻被名詞標籤的同一性所遮蔽。只是人們長期沿用「文化大革命」或「文革」這一符號，久已習以為常，筆者也只好「姑妄存之」繼續襲用。但此處有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問題：我們不能僅因為語詞名稱相似，便理所當然地以為背後所指稱的就是同一實體。奧威爾(George Orwell)曾在其名篇〈政治與英語〉(“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告誡世人，「最糟糕的事情無異於向詞語繳械投降」^②。歷史和社會現實中的語言可能包涵多重複雜意義，史學家對於語言與意義的歷史性應保持高度的敏感。

本文提出1966年前後半年間文革運動呈現兩種不同的勢態，這顯然有悖於大部分人關於文革發動的理解，亦顛覆筆者本人曾長期持有的認識。至此讀者一定會問，如果說文革初期的「文化革命」和數月後的「政治大革命」之間存在顯著斷裂，為何近半個世紀以來，無論是歷史當事人還是後世的研究者，均對此間差異視而不見？這其中蘊涵甚麼樣的歷史意義乃至史學方法論意義？筆者認為，這一認知盲區很可能源於文革運動發展的結果，人們通常會以1966年8月後驚心動魄的運動形勢(〈十六條〉)的頒布、紅衛兵運動的爆發、

「炮打司令部」與打倒劉少奇、大規模造反運動的興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等)作為歷史認知的起點,來觀照和解釋之前的事件、人物、文本。於是,批判《海瑞罷官》之類的事件被認為僅是後來的「政治大革命」的前奏,文革初期的文化鬥爭被理所當然地化約為運動發展的「準備」或毛澤東政治謀略的體現。從這一視角來看,文革以文化鬥爭作為開端的歷史意義被消融和忽視;「文化革命」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史學範疇,其歷史意義與可視度被遮掩;作為激進「文化革命」反擊戰之號角的〈通知〉被混淆於〈十六條〉,其獨有的文本和政治意義亦被消解甚至扭曲。

如上篇所述,「輝格式史觀」的主要特徵是以「當下」作為準繩和參照來關照和理解「過去」,以「終點」而非歷史現場或過程中的特定語境來理解事件、人物和文本^③。「輝格式史觀」是二十世紀史學領域中最富有批判性影響力的方法論概念之一,在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看來,這種從結局反觀過程的倒推追溯式敘述是一種極為常見的史學謬誤(fallacy),「以今視古」、「以後釋前」是許多研究者難以抗拒的誘惑^④。本文力求克服文革史領域中根深蒂固的「輝格式」無意識,將事件置於特定的歷史情境中,而非用事後的知識和眼光去考察、理解;通過「設身處地」地回到歷史現場和歷史語境,開啟一條擺脫「事後諸葛亮」的敘事路徑,以期打開歷史重構和解釋的新的可能性,以展示歷史進程被扭曲和遮蔽的高度複雜性。

行文至此,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如果說文革運動在1966年上、下半年之間存在明顯的斷裂,假如說彼「文化大革命」並非此「文化大革命」,那麼,這兩種部分相異的「文革」形態之間究竟有着甚麼樣的歷史聯繫?一場激進「文化革命」何以演變為以「大民主」為基本特徵、以黨政機構和官僚群體為主要打擊對象的「政治大革命」^⑤?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毛澤東在此複雜過程中的心路歷程?他的想法和決策,前後可能發生了甚麼樣的改變?1966年下半年後,隨着大規模造反運動在全國的展開,激進文藝和學術批判以及「教育革命」等「文化革命」內容並未消失,但它們在作為「政治大革命」的文革中究竟處於何種地位?另外,即便在文革運動的中心矛盾轉換之後,毛澤東本人及其追隨者也頻繁在事後調整先前的說法,從而構建前後一貫、永遠正確的「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的政治神話,以維護最高領袖的英明神武形象。也就是說,「輝格式史觀」不僅涉及史學解釋與批評問題,同時也提供了一個考察和理解文革中政治話語建構過程的方法論視角。所有這些都是文革史學者需要進一步探究的問題,本文的目的並不是回答這些問題,而是通過提出新的問題以進一步拓展歷史闡釋與敘述的可能性。

本文認為,唯有從特定歷史與政治語境出發,詳盡、系統地梳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高層發動文革的原初意圖,確立「文化革命」作為一個相對獨立於「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敘事與分析範疇,才有可能打開以原創性問題意識為驅動的新的敘述空間。只有如此,從1966年7、8月前的激進「文化革命」到夏季之後的「政治大革命」之轉化,以及此過程中所涉及的種種複雜張力與曲折演進,才有可能進入學術視野。無論從史料抑或分析視角而言,這是能夠超越對文革史的固化解釋、推進歷史理解的基礎所在。(本期續完)

註釋

- ① 關於〈二月提綱〉的制訂和匯報過程，參見龔育之：〈《二月提綱》和東湖之行——《從〈二月提綱〉到〈匯報提綱〉之一〉〉，載《龔育之回憶：「閻王殿」舊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39-64。
- ②④ 《彭真傳》編輯組編：《彭真年譜》，第四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2），頁466-69；482。
- ③ 〈中共中央批轉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1966年2月12日），載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13）。下引〈二月提綱〉內容均出自此註，不再另註。
- ④ 劉志堅：〈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產生前後〉，載《風雨征程》（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6），頁209、210。
- ⑤ 〈中共中央批發《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及附件〉（1966年4月10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下引〈二月紀要〉內容均來源於此，不再另註。另可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403。
- ⑥ 〈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人民日報》，1966年4月19日，第1版。
- ⑦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紅旗》，1966年第7期，頁20-23。
- ⑧ 〈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人民日報》，1966年5月9日，第1版。
- ⑨ 姚文元：〈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人民日報》，1966年5月11日，第1版。
- ⑩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937。
- ⑪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摘錄）〉（1966年3月17日至20日），載鋼二司武漢大學總部等編：《毛澤東思想萬歲（1961-1968）》（武漢，1968），頁257-58。翦伯贊、吳晗、侯外廬、呂振羽、范文瀾等人並列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文革中皆遭到殘酷打擊。
-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567；568-69；572-73；573-74；580；581；606；589；593；618；619。
- ⑳㉑㉒ 《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405；1417；1440。
- ㉓㉔ 〈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3月20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 ㉕ 參見鄭謙：〈從《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到《二月提綱》〉，載李海文主編：《彭真市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頁149-50。
- ㉖ 〈張春橋1966年5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載周良霄、顧菊英編著：《瘋狂、扭曲與墮落的年代》，第一部，〈十年文革前期（1965.11-1969.4）繫年錄〉，電子版（香港：新大陸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頁110。
- ㉗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572-73；《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406；〈與康生等同志談話紀要〉（1966年3月28日至30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1-1968）》，頁258。
- 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66；74-79；81；194-95；88；195；196-97。
- ㊱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573；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頁107。
- ㊲ 毛澤東：〈對共青團九屆三中全會的指示〉（1966年4月），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 ㊳ 4月19日的簡報說，高教部認為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從學術觀點上批判得多，從政治觀點上批判得少，沒有自覺地認識到這是一場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階級

鬥爭。高教部黨委在4月17日召開的會議強調，各級領導必須明確這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文教戰線上的兩條路線鬥爭，是徹底清除資產階級專家壟斷教育和奪取教育領導權的鬥爭；高校的所有工作都要和學術批判結合起來，通過學術批判來推動教育革命和教學改革。參見〈對高教部黨委部署深入開展學術批判情況簡報的批語〉（1966年4月23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46-47。

②⑨ 浙江省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毛澤東與浙江》（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頁267。

③⑩ 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冊（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1），頁431-32。

④⑪ 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續）》（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頁239。

⑤⑬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頁638。

⑥⑭ 〈偉大的歷史文件〉，《人民日報》，1967年5月18日，第1版；《紅旗》，1967年第7期，頁7-11。

⑦⑮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頁22。

⑧⑯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1.

⑨⑰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及原件附件之二〉（1966年5月16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下引〈五一六通知〉內容均出自此註，不再另註。

⑩⑱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頁167。值得一提的是，「反革命份子睡在我們的身旁」的說法，源於毛澤東1964年7月與正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唸書的侄子毛遠新的談話。談話中，毛澤東嚴厲批評大學生缺乏社會經驗，不了解階級鬥爭：「甚麼地方都有階級鬥爭，都有反革命份子。陳東平不是睡在你的身邊嗎？……你與反革命睡在一起還不知道？」陳東平是開國上將、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長子，1962年因給台灣情報機關寫信被開除學籍、軍籍。陳東平和毛遠新是大學室友。參見〈同毛遠新同志的第二次談話〉（1964年8月），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1-1968）》，頁162。

⑪⑲ 王力：《王力反思錄：王力遺稿》，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8），頁382-83；421。

⑫⑳ 黃崢：《劉少奇研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166。

⑬㉑ 參見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頁75-78。

⑭㉒ 例如，在1964年6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會上，當劉少奇說中國出了赫魯曉夫，要各省都贊成也不容易時，毛澤東說：「要傳下去，傳到縣，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麼辦？中國出了修正主義的中央，要頂住。」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359。16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要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權。」參見錢理群：《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頁320。

⑮㉓ 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是毛澤東和劉少奇決裂的開始，毛澤東一直耿耿於懷，用江青的話來說：「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參見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281。

⑯㉔ 參見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第七章。1970年12月毛澤東接見美國記者斯諾（Edgar Snow），斯諾問及何時「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毛澤東答道「那就早囉」，明言他在1965年初就已下決心發動一場革命以打倒劉少奇。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頁357。但筆者以為，用事後的話來說明他以前的內心想法，在論證邏輯上是有問題的。

④⑥ 美國政治學家羅德明 (Lowell Dittmer) 在半個世紀前出版的專著 *Liu Shao-Ch'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中就曾提出，打倒劉少奇未必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初目標，而劉少奇的倒台很可能是文革運動進程的不可事先預知的結果。遺憾的是，這一具有高度原創性的觀點因材料的歷史局限，未能得到充分論證，長期以來未被學界注意。麥克法夸爾的權威著作《毛澤東最後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 及其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均未提及羅氏的著作。中共黨史學者黃崢在《劉少奇冤案始末》(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26-27)中也提出類似的觀點，但亦未獲得學界充分關注。

④⑦ 《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頁648。「五條不怕」指的是毛澤東曾提倡過的：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老婆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參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毛澤東秘書手記》，增訂本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97。

④⑧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883。

④⑨ 黃崢：《劉少奇冤案始末》，頁8。

④⑩ 〈肖華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3月17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④⑪ 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人民日報》，1967年4月1日，第1版。

④⑫ 〈偉大的歷史文件〉，第1版。

④⑬ 穆欣：《劫後長憶：十年動亂紀事》(香港：新天出版社，1997)，頁104-105。

④⑭ 參見朱悅鵬(參與起草社論的當事人)：〈陳伯達利用《人民日報》煽風點火見聞錄〉，《炎黃春秋》，1994年第7期，頁13-18；錢江：〈《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的出籠〉，《世紀》，2011年第4期，頁37-40。

④⑮ 以上內容參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報》，1966年6月1日，第1版。

④⑯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公司，2005)，頁275-77。

④⑰ 〈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人民日報》，1966年6月2日，第1版。

④⑱ 參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宣傳教育要點〉，《人民日報》，1966年6月6日，第1版。

④⑲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紅旗》，1966年第8期，頁4-11。

④⑳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改革高等學校招考辦法〉，《人民日報》，1966年6月18日，第1版。

㉑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針——重新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按語〉，《紅旗》，1966年第9期，頁26、27。

㉒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人民日報》，1966年8月9日，第1-2版。下引〈十六條〉內容均出自此註，不再另註。

㉓ 〈毛主席同胡志明主席談話記錄(未經本人審閱)〉(1966年6月10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㉔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38。

㉕ 參見“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Deleg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d by Comrade Zhou Enlai,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lbania [Excerpts]” (June 1966), <https://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7703>。

㉖ 〈十六條〉中至少有四條主要涉及「文化革命」問題：第十條(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學校的現象)、第十一條(學術、文藝領域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

及其反動觀點)、第十二條〈對待科學家、技術人員的政策〉、第十六條(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被認定為文革的「行動指南」)。

⑦⑥ 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8月13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⑦⑦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2月3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⑦⑧ 〈陶鑄在中國醫科大學的講話〉(1966年8月23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1966年6月20日，中國醫科大學一學生給陶鑄寫信，表示不同意一些同學提出的「懷疑一切」的說法，7月3日陶鑄回信對此觀點表示讚賞，但在8月23日醫科大學的講話中卻改變立場，表示支持「懷疑一切」的看法。

⑦⑨ 關於四清後期的轉向，參見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第七章。

⑦⑩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匯報會上的講話〉(1966年10月24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1961-1968)》，頁273。

⑦⑪ 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25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⑦⑫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33。

⑦⑬ 〈對林彪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師生大會上的講話稿的批語和修改〉(1966年9月15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頁135。

⑦⑭ 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下半年後「文化革命」主題逐漸淡出，當時曾有不少人表示不解甚至不滿。1966年11月，《解放軍報》總編兼《人民日報》代總編唐平鑄接見文藝工作者時，有人發問，既然文藝是「文化革命」重點之一，為甚麼《人民日報》一篇社論也沒有？另有人問，〈十六條〉指出文藝與教育是重點，應該如何理解此處「重點」的意義？與會者要求報紙予以「補正」：「採取革命的行動，了解文藝界的形勢，做適當的處置，或上報，或發社論。」參見〈唐平鑄接見各地來京串聯的革命文藝工作者時的談話〉(1966年11月14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⑦⑮ 王力：《王力反思錄》，上冊，頁202-203。據徐景賢回憶，12月27日姚文元向上海市委寫作班傳達毛澤東最新指示，據姚文元說，毛澤東在祝酒時的原話是「祝全國全面內戰開始！」參見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社，2005)，頁8。

⑦⑯ 〈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人民日報》，1967年1月1日，第1版。

⑦⑰ 〈偉大的歷史文件〉，第1版。十一個月後，1968年4月，毛澤東提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頁159。

⑦⑱ 〈中共中央批轉林彪同志「八·九」重要講話〉(中發〔67〕320號文件，1967年10月19日)，載《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⑦⑲ George Orwell, "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rlando, FL: Mariner Books, 1970), 169.

⑦⑳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65).

㉑ 羅志田曾用「倒放電影」來形容「輝格式史觀」，這是一個很生動形象的比喻，其中也包含「後見之明」的意思。參見羅志田：〈民國史研究的「倒放電影」傾向〉，《社會科學研究》，1994年第4期，頁103-105。

㉒ 筆者正在撰寫英文專著 *The Coming of Mao's Last Revolution*，詳細檢視這一充滿複雜張力與曲折矛盾的演變過程。